

我的硕导是永骏

田原

一

一月作为新年伊始，总会带给人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感觉。但自二〇二一年起，一月却成为我的特殊月份，充满悲伤与苦涩的回忆。因为母亲在这一年的一月，平静地走完了她八十四年的人生旅程。可万没想到的是，是永骏老师竟然也在这个月成为不归人。

二月初，手机屏幕上突然跳出平时很少联络的、大阪外国语大学时期硕士班同学的名字。还以为是老同学又在报刊或书店看到了我的日语文章或新书，像以往一样发表一通感慨什么的，而出人意料被告知的却是永骏老师在几天前过世的噩耗。

挂掉简短的电话，遂打开电脑在日语 yahoo 上搜索了一番，没查到任何有关老师去世的讯息。有的也只是在维基百科里看到他出生于一九四三年九月，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才刚满杖朝之年，还没有达标日本人平均寿命的八十三岁。我想，或许正如同学在电话里所言，可能事发突然，家人一下子陷入了惊慌失措的悲痛之中，没有时间也没有余力和心情对外发布讣告吧。

一九九五年秋，接二连三的考试（笔试和面试）像命运的轮番轰炸。一个多月后终于在焦虑、紧张、等待的拷问中，接到大阪外国语大学大学院合格通知书。我报考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拟定的硕论题目是“朦胧诗之后的第三代诗歌研究”，导师正是永骏老师。报考大阪外大前只闻其名并未见过他。记得在选校和报考院生（研究生）专业时，曾咨询过我当时就读的天理大学的植谷元（1931—2016）教授，他是我

日本文学的启蒙老师，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在无数教授可望而不可及、一生无缘被青睐的岩波书店出版过多种专著。有趣的是植谷老师在京大读书时，竟然还听过诗人谷川俊太郎的父亲谷川彻三的哲学课。植谷老师当时强烈建议我报考日本文学专业，这样才能体现出我来日本留学的真正意义。还说中国人来日本留学，在日本的大学研究中国文学虽无可厚非，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总感觉很滑稽……等等，并力荐我报考某某国立大学的某某教授。虽然很想接受植谷老师的好意，但考虑到自己对日本文学知识储备的贫乏，以及当时磕磕巴巴的日语能力，即使幸运考上某某大学，也肯定是度日如年的煎熬，很难保证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于是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决定侧身漂移，报考相对有点自信的专业，就选定了只有两三千学生的单科大学大阪外大（现在的大阪大学外语系。二〇〇七年九月因新成立的国立大学法人法被废除）。这一想法后来也得到了植谷老师的理解与支持。

现在想来，进入大阪外大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轻松、浪漫、愉快的两年时光，奠定了我的日语和日本文学薄弱的基础，可以说是我真正深入日语语言内部和翻译日语诗歌的缓冲期，也是我接近日语这种语言本质的关键时期。读硕期间，我仿佛如梦初醒，似乎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从教科书日语到日常口语日语的跨越。

这些天，为写这篇文章，我拼命地回想，怎么也想不起来是永老师在硕士班的两年间，都给我们具体讲授了哪些课程。印象中好像讲授过北岛、芒克的几首代表作的日语翻译，在课堂上让同学们对照原文找误译、挑毛病。朦朦胧胧记得我好像没有交出让老师感到满意的答卷，只觉得老师对每一首诗的日语翻译都用词准确，无可挑剔。其实，我那时的日语能力并不支持我能从日语译文中找出词不达意的词语，以及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微妙差异。

比起讲课，是永老师偶尔在课堂上讲一些带有即兴性质的题外话（日语叫杂谈，跟现代汉语里杂谈一词的意思有出入）却使我记忆犹新。

若稍加追忆，他的音容笑貌便都会一幕幕清晰地浮现眼前。平时上课，是永老师总是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他的脸部轮廓分明，典型的美男子形象，给人一种高冷难以接近之感。这一点大概也是我和班上同学普遍对他发怵的理由。每次进教室，他一定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衣服的色彩搭配、衬衫和西装的穿着都十分得体，几套颜色、款式不同的西装在他身上轮流换班，颇有规律。暑假前，常常见他穿着西式短袖上课，肚子圆鼓鼓微微隆起，侧面看像是怀上几个月的“中年太”（“中年太”为日语词汇，意为中年发福），棕色的皮腰带好像快扣到了最顶头的那个孔。那时年轻，缺乏健康常识，现在一眼就能断定那属于内脂肪超标，会直接影响到心脑血管。因为是院生的课，听课的学生也就十来位，教室很小，最多也就三十多张课桌。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是永老师站在讲台上，俨然驾到的君主，双眼皮的大眼睛清澈有神、锐利而自信，颇具侵略性和穿透力。他每次上课，一进教室总是先习惯性地快速环视一下在座的同学，那时他的目光就像敌方的探照灯从身上扫过，心里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一股凉飕飕的感觉。

在课堂上讲题外话时，是永老师的表情看上去最为轻松、丰富，也是他露出笑容最多的时候。他每次的笑都很短暂，像闪电一闪而过，灿烂、纯粹、宁静、深邃，是那种不含任何杂质的纯真的笑。记得他曾说每次去中国参加活动，常常会被国内的学者叫作“是老师”，忽略他姓氏中的另一个字“永”，弄得他哭笑不得，然后得不停地给大家解释。第一次见到他笑，是在我还没有正式进入大阪外大读书之前的一次面试考场。是永老师是当时的面试官之一，因为报考了他的专业，面试时也几乎都是他在提问。他让我谈一谈为什么翻译谷川俊太郎的诗歌以及其作品特征。待我回答完毕，他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说中国现代诗与日本现代诗的最大区别在哪里？我紧张地狡辩了几句后，说像谷川俊太郎“握着自己的小鸡鸡转来转去”这样的诗句，中国诗人写不来。是永老师听后哈哈大笑，前倾后仰之中，还不忘用右手扶正一下自己的领带。

二

在大阪外大读书期间，单独跟是永老师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一是老师忙碌（那时他还担当着汉语课），二是同学们都躲闪着他。读硕的两年间，很幸运地见证了是永老师所做的几件功德无量的事：《今天》复刻版出版；分别在大阪、东京举办颇具规模的《今天》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会；招待纵横日本学术访问的谢冕夫妇。《今天》复刻版因为不熟悉具体过程，简略谈一下纪念会和接待谢冕夫妇的几个细节。记不清是在硕一还是硕二了，谢冕老师应东京大学之邀访问日本，第一站好像是九州大学，接待者若我没记错应该是九州大学的秋吉久纪夫教授（秋吉教授也是诗人、学者、翻译家。一九三〇年生于北九州市，本名秋吉胜广，三十七岁获得九州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的翻译和研究。截至目前，他应该是翻译中国现代诗人作品最多的人，出版有近二十册中国现代诗人诗集，数十种研究专著。先后获过日本翻译家协会主办的“翻译特别功劳奖”、第一届“诗界奖”等）。是永老师负责关西（大阪、京都、奈良）地区的接待。约定的那一天，我提前赶到京都谢冕老师夫妇下榻的酒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谢冕老师，他身上散发着巨大的亲和力和智者风范使我一下子爱上他。而且谢老师还是对我有恩的人，刚来日本留学不久，他还为我薄薄的诗集写过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那时已过耳顺之年的谢老师充满活力，他的那篇序言对刚到异国他乡半工半读、备受乡愁和孤独折磨的我是莫大的鼓励。一个多小时后，是永老师风尘仆仆赶到酒店。就在那天中午，发生了一个意外小插曲。谢冕老师的同乡，也是谢老师的非在编博士毕业生L女士想让谢冕夫妇从酒店搬出来住在她家，既能好好款待老师，又能节省酒店费用，还能解决语言交流上的不便。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种想法合情合理。共进午餐时，谢冕夫人陈素琰老师流露出想在学生家住两晚的打算，是永老师当时没有明确反对。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没想到在我和是永老师

与谢冕夫妇告别去往车站的计程车上，是永老师突然勃然大怒，提高嗓门用汉语对L女士进行了一番猛烈抨击。我大吃一惊，不敢出声，只是默默地听。事后过了很久才理解是永老师的用心良苦，他是恪守原则、尽心尽责的人。在他负责接待的京都这几天，绝不允许出现些许差错，比如无法预料的意外——交通安全、起居饮食等等。还有就是L女士犯下了一个致命错误，应该在做出决定前事先跟是永老师沟通商量，或征求老师的意见才是。

记得硕士班第一学期的梅雨季节，阴霾的天笼罩着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没有围墙的校园。有一次老师提前下课，那一天他看上去明显不在状态，情绪似乎有些低落。他临走出教室时，突然转过头说：“田君，到我研究室来一趟。”心头不禁一紧，几分钟后我敲响老师的研究室门。窄小的研究室堆满了书，门后的地板上摆放着到我胸脯高的两摞书，我扫了一眼，是日文版的《北岛诗集》（土曜美术社，一九八八年）和《芒克诗集》（书肆山田，一九九〇年）。老师示意我在小圆凳子上坐下，屁股还没坐稳，老师便说：“昨晚跟太太吵架了，你们中国女性跟男人吵架时不知道退让一步。”我一脸茫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师接着又道：“中国女性都是这样吗？”我惊慌惊恐地压低声音：“基本上是的，因为中国提倡男女平等。”老师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随口说了一声“好吧”。那一刻我才知道老师的太太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人，长我两岁，籍贯还是我的故乡，心中有点窃喜。之后的谈话记不大清了。大概十多分钟后，老师从两摞书上各拿一本送给我，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北岛和芒克的日文版诗集。

一九九七年秋，日本中国学会前夜祭在大阪举行，邀请诗人芒克前来参加。记不清我那时是否加入了这个学会，只记得为了这场前夜祭，班上诗歌专业的同学（包括几位留学生）也跟着行动起来，跑前跑后负责翻译和协助不远万里从北京飞来的诗人芒克。

前夜祭结束不久，有一天是永老师面色沉重地走进教室，说今天不

打算讲课，要谈谈偶然看到一篇短文。边说边拿出夹在讲义里的一张在东京刚刚出版的、我从未听说过的中文小报，正颜厉色地质问坐在教室年岁较大（印象中是五〇后）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芒克真的说过“北岛靠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样的话吗？“反正跟我说了。”那位留学生回答后，又在老师的怒斥下顶撞了几句。原来是这位留学生参加完学会前夜祭后，给东京的一家小报写了一篇短文，文中好像写到了是永老师质问的那句话。记得当时老师越说越激动，喝斥声震耳欲聋，似乎使用了最严厉的言语谴责了那位留学生。那一刻，老师的脸色略显苍白，目光看上去更加犀利。沉默片刻后，是永老师用目光瞄准我，问道：“田君，你也在现场，你听到芒克说了吗？”我说：“没有听到，我坐得离芒克比较远。”整个教室弥漫着风雨欲来的紧张气氛，每位同学都紧绷着脸，仿佛临近一场严酷的审判。至今仍清晰记得，暴怒的老师摔门走出教室的背影。这是我读硕期间永远无法忘却、令人难过与愤慨、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事过多年，每每回忆这次“事件”，都会为老师容不下杂质的纯粹所感慨。

一九九八年岁末，由是永老师统筹、主导的《今天》创刊二十周年纪念会在东京举行。那时，我已经离开大阪外大，一边在两所大学做非常勤（外聘）老师，一边为考博做准备。回想留日以来的几十年，中国现代诗在日本有过两次最为体面的亮相，第一次就是《今天》的这场纪念会，第二次则为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初，由思潮社和中坤公司在东京学士会馆联合举办的第二场中日诗人深度对话（第一场二〇〇六年在东京举行）。记得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日本诗坛重镇大冈信（1931—2017）、谷川俊太郎、白石嘉寿子、吉增刚造等都纷纷登台，与北岛和芒克对话，并各自朗诵了自己的诗。在容纳千余人的东京滨离宫朝日新闻礼堂，坐满了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诗人、诗歌爱好者、出版社的编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士。那时的北岛和芒克就像是明星，在日本诗歌界和媒体引起广泛关注。当时的《朝日新闻》《东京新闻》等和几家文学

期刊都给予了报道。

不言而喻，纪念会取得的巨大成功皆为是永老师一个人努力的结果。为那场纪念会，他事无巨细地做了大量工作：申请会场和活动经费、跟参加的每位日方诗人协商沟通、预订北岛和芒克从纽约和北京飞日本的国际往返机票，以及他们俩在日本国内的行程（包括车票、住宿、餐饮等等），繁琐又耗神。

一九九八年春，如期完成硕士论文答辩顺利毕业。因为对自己缺乏自信，再加上当时满脑子抄中国文学近道的惰性思维，当然也存在在经济上报考自己的大学可以免去三万日元和二三十万日元的报考费和入学金这一因素，我又报考了是永老师的博士生（那一年是永老师五十五岁，是他第一次成为博士生导师，我的博士考试是在一九九七年底），结果被“拒之门外”，那是我留日以来唯一经历的一次“挫败感”，当时觉得有点委屈，因为我每门课的成绩都是A（那时的成绩分按A、B、C、D标记，D则为六十分以下的不及格。多年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教育改革，每节课由原来的九十分钟改为现在的一百零五分钟，成绩标记也划分得更细，改为S、A、B、C、D、F。S为九十至一百分，F则为丧失补考资格），论文也得了最高分。现在看来，恰恰是这次“挫败感”成就了我的今天。它让我彻底放弃了惰性思维，与中国文学研究暂时告别。如果我今天还算在日本文学界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也都是这次“挫败感”赋予我的。

三

是永老师是一位不折不扣极其感性和敏感的人，纯一不染，给我的感觉比较情绪化，带有一定的完美主义倾向，性格上有宁折不弯的不妥协精神。我个人推测，现实生活中，比起普通人，是永老师可能是活得相对疲惫的人。读硕期间并不知道他写诗。毕业多年后，在东京跟诗人

财部鸟子（1933—2020）的一次聚会上，财部告诉我，是永老师不但翻译、搞研究，也是一位诗人，诗还写得不错，只是不被大家所知而已。第一次知道财部鸟子的名字也是在硕士班的第一学期，记得当时是永老师将她的名字写在黑板上，说财部是日本当代优秀的重要女诗人，还在她的名字上方特意写上假名发音，以便留学生们记住。财部鸟子的姓在日本不多见，对外国留学生而言，初见此名有阅读难度。之后很多年，财部鸟子作为日本战后非同寻常的诗人一直占据着我内心的一角。博士毕业在大学任教，在系统阅读了大量日本现代诗人的诗集，出版了几本日语诗集之后，通过我对财部作品不间断的系列阅读（她的每本书都寄赠过我），改变了对她的看法。财部确实是一位优秀诗人，在日本国内获过一些颇为重要的诗歌奖，还担任过日本诗歌协会的会长。尽管如此，财部鸟子究竟在日本战后诗坛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从我对战后诗坛的认知，单是女诗人而言，她也很难跻身于前十名。

由于财部鸟子特殊的人生经历，作为战争期间日本开拓团的第二代，她的幼年和少女时代在中国东北度过。随着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滞留在中国的她为了逃脱俄军的蹂躏女扮男装，最后历经各种波折返回日本。她早期作品的主旋律主要是抒写滞留中国的残酷记忆。中年之后，她风华正茂的儿子在东南亚独自旅行时意外去世。这种中年丧子之痛的人生悲剧像永远褪不去的疤痕，刻印在她之后的作品里。她的诗歌语言构成巧妙，对意象的运用也有机灵之处，但总感觉欠缺了些什么。财部鸟子还翻译过一些中国现代诗人的作品，财部说她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都会让是永老师过目修改。在我还没开始用日语写作之前，财部也翻译过我的一些诗作，至今仍对她心存感激。

十多年来，几乎每个月都会收到好几本出版社或作者寄赠的诗集。在家里，我把诗集分为三类放置在另一个榻榻米的房间，一类是看了一两首随时处理掉的；另一类是要认真阅读准备写进每年年底出版的《现代诗手帖·诗歌年鉴》里的；最后一类则是为数不多需要永久珍藏的。

否则，有限的室内空间很快就会被诗集占满。二〇一八年初秋，收到是永老师的诗集《平静的剥离》（书肆山田，2018年9月）有点惊讶。毫无疑问当然是先要放在床头边阅读，然后归类到永久珍藏。

因为国内诗人对这家出版社了解甚少，我略微介绍一下出版过北岛、芒克诗集的书肆山田社。这家出版社成立于七十年代初，经营者换了好几茬人。二〇〇三年，现在的出版发行人铃木一民从上一位经营者手中接过了出版社的经营权，近二十年出版过很多诗人的诗集，包括不少活跃在第一线的知名诗人，性质属于百分之百自费。书肆山田一直都是铃木和长他十岁的太太大泉史世两个人在经营。大泉史世毕业于东京大学，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家，也精通设计和装帧。他们出版的诗集无论封面还是内文版式编排，都新颖美观，十分考究，在日本诗歌界赢得了良好口碑。而遗憾的是，伴随着大泉史世在二〇二二年五月九日病故，为出版社的经营画上了句号。据说交了钱还没来得及出版的书款已经陆续退回，现仍处于休业状态。听不少日本诗人说，铃木只负责销售，审稿、编辑、设计、校阅主要由他太太大泉史世一个人担当，夜以继日，积劳成疾，一病不起。在各种诗歌活动现场跟铃木聊过几次，他的上嘴唇总是留着一缕黑短的胡须，开朗善谈，爱开玩笑，据说更爱喝酒，常常酩酊大醉。

《平静的剥离》总共收录了二十二首诗作，不足一百页。从二千四百日元的税前定价来看，首印册数应该不多。诗集的书名采用了一首诗的题目。这首诗略长，细读起来耐人寻味。让我的博士生翻译出来，引用如下：

†

卡布奇诺

蓬松绵密的奶泡

被永远之风吹拂，发出闪光

包裹住

曜变天目¹般的深宇宙

✦

你走在海湾路上

白色的运动鞋在沙地留下浅浅足迹

从足迹奔涌而出的

星星的喧腾

架在海湾上的遥远银河

✦

燕子飞过天空

那是蓝宝石般闪耀的宇宙

赤道正下方的金色蚕茧

祛除邪气

万里无云的深空

✦

瑞香花叶底的黄金虫

百日红花苞里的熊蜂

在似火红叶的波涛中潜行的女人

1 被认为是天目茶碗的最高杰作。茶碗烧制过程中，其黑色釉料的变化会形成呈现不同色泽的斑纹，成为其特色。

隐隐约约的发际

自云朵间倾注的光芒
的水珠在孩子们手上跳跃
母亲慈爱的劝诫之声
花朵有花朵生命的光辉
杏子的花又有何烦忧

✦

索拉里斯星¹

十年前自杀的妻子
出现在登上这颗星球的男人面前
男人脑海里的想象
由神一般的星球之海物质化，使其显现
那位女性
渐渐了解
自己究竟是谁
对于那个男人又意味着什么
并爱上男人
然后
她预感自己并不能成为男人的妻子
便吞下液氧

1 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执导的电影，改编自波兰作家史坦尼斯劳·莱姆的同名科幻小说。

试图自杀

然而

女人僵硬的身体却渐渐复苏

薄纱一般的衣服湿润地贴在身体上

透出女人的乳房、腰

仿佛触了电

先是突然颤抖

随即演变为激烈的痉挛，苏醒

中微子世界中不存在“死亡”

+

迷路在花朵盛放的深处

眩晕于雌蕊偷偷散发的香气

蓦然回首

昏暗的树丛下

乳白色的石头

在耀眼肌肤的女神手中碎裂

崩散

柔和的雨落在梨花上

+

疯马狂奔在黑暗的森林

它那健硕肉体的突进、击破，以及发光

钢铁月光贯穿它的身躯

+

鱼儿戳弄柔软的雌蕊

蜜瓜微微青涩的气味在口中散开

旋即涩口的甜味儿久久不去

舌头泛起微弱的痉挛

与翩翩飞舞的

樱花色的可爱蝴蝶嬉戏

雪白的云，摇晃的麦穗

被敲响的山上的钟

次元平静地剥离

云朵一端有鱼儿飞翔

麦穗化作闪光的箭

射向虚空

+

卡布奇诺的奶泡里潜伏着

巧妙操纵深宇宙的妖精

撅起可爱的嘴

悄悄吹出彩虹色的泡泡

又消失在黑暗中

吹出来的泡泡四散漂浮

在含住其中一个剥离泡泡的你

的眼中
 一个小小的银河
 摇曳生光
 逐渐远离
 想见又不得见的
 你的眼中
 能看见大海的时髦咖啡店
 窗边坐席上的卡布奇诺

——是永骏《平静的剥离》（刘沐昉 译）

是永老师的这首诗写得很用力，也写出了他内心温柔的一面，在丰沛想象力的驱使下，语言自然而然地徐徐展开，虚实交替，节奏舒缓流畅。诗句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地由具象进入抽象，写实的场景由近而远，与虚构的幻象相互交错，彼此折射，生动、细腻地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诗意由此跌宕起伏，时间与空间重叠相映，形成了这首诗自身的时间范围。在拓宽诗歌内在空间的同时，增强了这首诗的不确定性和审美情趣，为读者留下了无限的回味与遐思。诗中两次出现的“自杀”、一次出现的“死亡”引起我的注意，尤其是“自杀”一词颇值得玩味。“突然颤抖”“激烈的痉挛”“柔软的雌蕊”既透露出对性的暗示，又传递出生命的张力，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单是读这首诗，横亘在语言与想象、叙述与抒情、个人经验与表现能力等诗学上的诸多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现代性与思想、日常生活在诗歌中的协调统一等，诗人在此展现了独自的表现技能。

四

人降临于世，被动之中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人注定离世，无奈之中带有无法抗拒的必然性。

死亡作为生命的终点，对所有向死而生的哺乳类而言，都是永远无法逃脱的宿命。

“月有盈亏，花有开谢，想人生最苦离别。”元朝诗人张鸣善如是说。

这些年，迈入耄耋之年的谷川俊太郎的创作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常常在诗与文里写到死亡：“死亡让我对来世充满好奇”“愉快平静地等待死亡的造访”“天国和地狱之门是何种颜色呢”等等。让我对生死有了新的认识。谷川俊太郎面对死亡的坦然与从容的人生态度，是自信也是超然，对我内心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生死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左右着每个人的生命走向。但我觉得死亡更具有伟大性，它不分阶层种族、不分男女老少、不分高低胖瘦美丑、不分贫富贵贱，公平地静候着每一个人。

二月初，惊闻是永老师在陪同夫人和千金散步时因突发心梗驾鹤西去，悲从中来。之后数日，一有空便情不自禁地回忆跟他互动过的每个瞬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印象中，总感觉他深邃的目光深处暗藏着巨大的、永远挥之不去的悲伤。后来知道他写诗，觉得这或许是诗人与生俱来的忧郁所致。直觉告诉我应该不是，但我找不到答案。

是永老师去世十多天后，终于在二月九日的报纸上看到报道他的几十个字的讣告。讣告在日本是一种文化习惯。大学教授（无论著作等身，还是一辈子没写过几篇像样的论文，甚至没出版过一本研究专著的平庸教授）、社会名流、在某个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人，去世后报纸都会发表一则长度大致相同的讣告。

接到久未联络老同学的电话当天，旋即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一段话，现引用如下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一九九八年硕士毕业后跟导师联系不多。之后，是永老师迎来人生的巅峰，先后担任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校长；立命

馆亚洲太平洋大学校长、立命馆大学副总长。二〇一二年，六十九岁的是永老师获得大阪大学语言文化学博士学位。二〇一五年，他从大阪远道而来，特意来东京参加我执教的大学举办的诗歌活动。当时我在多功能厅舞台上做主持，并未留意到坐在台下前几排的是永老师。研讨会结束后，是永老师从舞台侧面走上来，用日语式的汉语高声说道：“田原，你大成功！你大成功！”然后又用日语对着周围我的几位大学领导和同事把我赞扬了一番，当时羞愧无比。二〇一八年，陪诗人北岛去神户旅行，曾跟是永老师夫妇共进晚餐，叙旧言欢，十分难忘，万万也没想到那次重逢竟成诀别。记得二〇一八年收到他的诗集后，我曾在当年年底出版的十二月号《现代诗手帖·诗歌年鉴》上写过读他诗集的感想，但愿老师生前能有看到。

2024.05.03—04，写于日本